

张謇与天生港电厂（下）



1921年春，天生港电厂基建工程在大达后街开工，标志着天生港电厂的建设正式启动。根据1921年3月3日《新闻报》，预定的工程进度是：“三月动工，五月电机到，六月引擎室建筑竣工、动手装机，七月锅炉管子到通，八月厂屋完工、装锅炉，十一月全部机器装毕，十二月试机，民国十一年一月开始送电。”根据大生档案中《电厂辛酉年工程材料机器及各项开销银钱帐略》记载，1921年天生港电厂购买钢条、水泥、黄沙、石子、砖瓦、石灰广木、桐木、洋松、白铁、柏油、白漆等多种建筑材料，购置钉子、铰链、插销、玻璃、螺丝、铅丝等配件，建造机器栈房、厂房、烟囱、物料所、办事房、厕所等生产、办公、生活用房。

1922年初建成发电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。近代南通工业企业的陆续设立，是在大生纱厂的基础上，主要依靠已有企业的资金投入和引导，不断滚动发展的。天生港电厂是在大生企业不断获利的背景下筹建的。据《大生系统企业史》，大生一厂、大生二厂1919年、1920年两年，利润率达90%上下，其中1919年大生一厂为105.78%，大生二厂113.2%。1922年起大生诸企业陷入困顿，债台高筑，自身尚且不保，无力再拨款支持天生港电厂的建设。

民国十一年(1922年)六月一日，张謇给上海华发实业公司的管趾卿写了一封信。上海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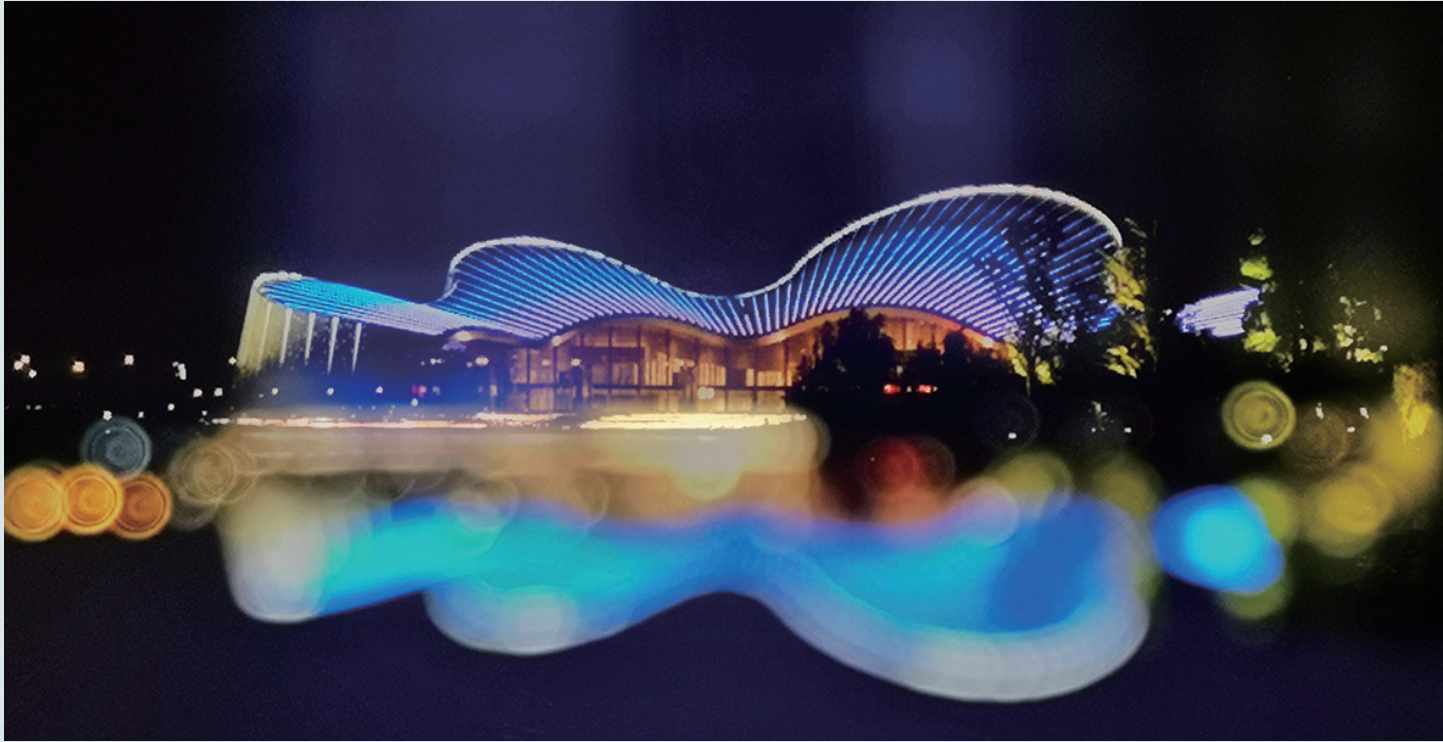
发实业公司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销售代理，其广告称“西门子厂驻华代表”。由这封信可知，西门子生产的发电机(托朋)1921年已经全部运抵上海，除了小部分运到南通外，其他都暂时存放在栈房。张謇“顷承见示某处急需此类托朋一座，南通既不待用，正可分出一座让予先用，以缓济急，实属两便”。但张謇对于天生港电厂没有彻底放弃，只是打算暂时出让发电机一座，“惟原有合同既不取消，则此次让出之托朋一座，自应仍由贵行补运来沪，以符原数。补交时期以十个月为限，在民国十二年三月底以前必须将全部补交清楚，幸勿迟误”。张謇希望通过腾挪，换取时间，指望赢得转机。然而事与愿违，1947年《南通天生港电厂》痛惜地回顾：“垂成厂房，被迫停工，到沪机器，亦以无法付款而不得不转让与普威墅堰震华电厂；糜款七十余万，未能完成，良可扼腕。”

1925年，大生一厂的债权人上海银团派李升伯到南通，考察大生企业的实际情况，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。李升伯到南通后，与张謇进行交流，并在张謇的安排下参观张謇所创的事业，足迹从南通一直到东台。李升伯制定一个在大生一厂不破产的基础上的厂务改革计划，根据他在1985年手书的回忆，内容包括：请求老债权人允许一千万老债停息还本；引用日本人纺织厂的科学管理，手脚并用，改良三十几年的旧厂；引用成本计算作为吸引借款资料；赎回大生副厂，并添办布厂；设立天生港大电厂减轻动力费用；引进纺四十支纱的美棉种子；试行改八小时制。天生港电厂的建设再次提出，成为复兴大生一厂的措施。这应该是张謇的电厂设想，得到李升伯的认同。

□朱 江

1931年11月28日，大生一厂在上海香港路银行公会召开股东常会。经理李升伯没有与会，但他之前(11月21日)致函董事会，提出改良机械设备和规建电厂的建议。李升伯认为：“旧有之原动力运动力小，燃费滋巨，不独逐年消耗过当，且于改良发展上发生莫大之阻力。”李升伯呼吁，尽管目前企业负债累累，但在失去土产土销这一本地市场优势的情况下，如果固守旧有藩篱，不进则退。李升伯在附上的《规建电厂案》中，真情回顾当年张謇始创天生港电厂的情景：“张前总理本有规划电厂供给通海各工厂需要之企图，目光远大，诚足令人景仰。惜乎事业未就，半途停顿，良可扼腕。”李升伯还描绘电厂建成后的远景：“仅以一、副厂言之，每日即可省燃煤斤五十吨，通年计省银十五万两。此外所余电力尚可分给其他工厂或电灯公司之用。不特此也，当地打米、榨油、织布，一切小工业亦将陆续兴起，尚有附带收入。故为本厂未来节省计，为发展地方工业、宽裕民生计，则规划电厂实为迫不容缓之图。”

在李升伯的力主下，大生董事会通过规建电厂的计划，并与上海银团达成协议，依旧在天生港重新建设电厂。经过勘察，天生港电厂选址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通请轮埠码头西侧空地30亩。订购英国拔伯葛25吨锅炉两座，德国葛益吉厂5000千瓦发电设备一组。1934年底，天生港电厂发电，由22000伏输电线路，从天生港经唐家闸输送至城区，再由城区延伸到江家桥大生副厂。张謇的电厂构想，通过李升伯——这位真正理解张謇宏愿的企业家的接力，至此终于得以实现。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



南通大剧院

□许 聪

陪女儿练琴

□黄俊生

小区里，有一家器乐业余辅导学校，每到周末，教室里便传来各种器乐悠扬的声音，宛如一个小乐队。每次听到这些声音，我都会停下脚步倾听凝眸。我对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情景太熟悉了，它让我心生感动和感慨，我的思绪穿越时光隧道，一下子回到三十年前，女儿学习钢琴的情景是那么遥远，又那么贴近。

那一年，上海的一位朋友要给孩子买台钢琴，打听到南通生产的“黑桃”钢琴，而他知道我与“黑桃”钢琴厂厂长关系不错，就请我帮忙到厂里挑选一台。厂长亲自带人到仓库挑选，同时撺掇我给女儿买一台，他眼睛看着工人装车，嘴里慢吞吞地说：“养养儿子富养女，女孩儿从小就应该在艺术熏陶中成长。孩子将来不一定能成为钢琴家，但在音乐里长大的孩子，素质绝对差不到哪里去。”

于是，我把“黑桃”钢琴搬回了家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当年女儿四岁，一个像刚刚出土的禾苗一样葱绿的年纪。从那时起，枯燥与充实、得到与失去、痛苦与快乐、期望与等待，种种矛盾冲突，涌向女儿的童年生活，也折射出我这当父亲的，在对待女儿教育问题上期盼和焦虑甚至烦躁的复杂心理。

平心而论，对于学钢琴，女儿是没有心理准备的，一个刚上幼儿园的稚童，对这个世界除了好奇，还是好奇，一切的成长之路，都是父母的安排。当我们把沉重的钢琴搬到二楼，它庞大的体积几乎占据房间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在一旁擦汗，女儿瞪大眼睛好奇地打量这庞然大物。她并没有意识到，从今往后，她的童年将失去许多笑声，失去在野地里奔跑跳跃的时光。

从那时起，每天晚上，二楼狭小的空间里就响起生涩、迟疑的钢琴声，琴声透过窗户，在楼道里回旋。我知道，每天听这样枯燥的琴声，对左邻右舍是一种折磨，不过，大家还是以宽容之心接纳了女儿对他们的折磨。所以，每当在过道与邻居相遇，迎面一句“女儿开始练琴了吗？”我都笑笑，以此表达歉意。其实，这样的折磨何止是左邻右舍，家长又何尝不是如此。曾经，我梦想，燃一炷女儿琴艺初成之时，老爸我泡一杯清茶，燃一根香烟，让女儿弹一首曲子，我微眯双眼，在纯净明亮的琴声里假寐；或者，请三五好友相聚，

让女儿即席弹奏，在亲友的啧啧赞声里，我矜持地笑着……

而这样的幻想，在每天的枯燥陪练中被磨灭。

我常思忖，作为父亲，在日常生活里，我还算是慈父吧，但在陪女儿练琴过程中，我绝对是暴君。我没有循循诱导的方略，又没有耐心细致的心性，除了每天晚饭后守时守刻地把她按到琴凳上，然后就是大声呵斥，指责她的种种失误，完全不懂得，鼓励和表扬是通向成功之门的金钥匙。女儿现在性格柔弱，说话细声细气，人人都说她是淑女范儿，我不知道这跟她学琴接受音乐熏陶没有关系，更不敢肯定是不是我厉言训斥造就的，我只记得，每次我大声训斥：“手指立住”“慢，再慢，还要慢”时，她都像小猫一样怯生生地瞧我的脸色，从来不辩解，不抗争。

那时的气候，冬天比现在冷，夏天比现在热，家里没装空调，热时热煞，冷时冷煞。冬天，我在她脚下放只热风机，把她那双冻得通红的小手放在怀里捂捂，呵呵热气；夏天，我高踞在椅子背上，一手指点琴谱，一手为她掌扇。通常，我手边会有一把裁缝尺子，听到不协调音时就把尺子在椅背上敲得“啪啪”响，并威胁她再若犯错，定打手心不饶，而那把芭蕉扇，则是我发怒时拍打她脑袋的刑具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当女儿对某事不能理解时，我调侃她小时候一次发高烧烧坏了脑袋，不聪明了，而她总朝我翻一下白眼，回道：是被你用芭蕉扇拍脑袋拍笨了的好吧。那时，她被我责骂和责打之后，一声不敢吭，默默地在琴键上移动手指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这情景，让我心很疼，很想把她抱到怀里安慰一下。尤其是在练琴休息期间，看到她趴在窗口向外张望，看同年岁的孩子跳绳、捉迷藏、丢手绢，眼里流泻羡慕的神情；或者，在隔壁邻居居家孩子向大人撒娇、大大的笑闹一团的时候，女儿只能孤寂地在窗玻璃上呵气，在上面画圆圈，画图形，这图形，也许是她内心深藏着的美丽梦想，也许是她幻想重回童真童趣自由天地的诉求。每当时此，我自问：孩子应该有孩子的天地，我这么残忍地剥夺了女儿的自由，这当真是一条成长的必经之路吗？再说，女儿不见得就有钢琴天赋，让她如此刻

意地走这条路，难道不是家长情绪化的选择吗？此时，会有另一种声音在驳斥我：傅聪不是也没有钢琴天赋吗？他老子傅雷不是也严苛地监督儿子练琴的吗？傅雷在楼下写作，一旦听到楼上琴声停歇，立马冲上楼暴跳如雷，巴掌伺候。于是，我给自己鼓劲：不经历凛冽寒风，就没有春花含笑。

练琴的过程是痛苦的，枯燥的，这过程，不仅是对孩子意志的磨练与考验，更是对家长恒心的磨练与考验，谁能坚持下去，谁就能笑到最后。我上海那位朋友的儿子，在练了四个月后知难而退，钢琴放在家里蒙灰，与我女儿差不多时候练琴的孩子，有不少也放弃了琴童的理想，他们不是输在起跑线上，而是面对漫漫练琴之路失去坚持的信心和刻苦的毅力，不是说在这条路上走到最后的孩子都是最优秀的，但至少他们在今后的人生岁月里能耐得住寂寞，能以最大的隐忍力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

女儿在琴童之路上付出很多，也收获很多，跟着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寻访名师，与当时已小有名气的琴童王鲁交流，殷承宗演奏会上被选为献花琴童，克莱德曼的见面会上登台与他合影，参加全省钢琴考级优秀考生巡回演出，等等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在长期的学琴过程中，寻找到自信，自励，自立。在通过了钢琴考级十级的那年，她拒绝了我们让她放弃钢琴而专心中考的建议，坚持每天两小时练琴，把目标锁定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，每两周去南京师范大学请管科亚教授辅导。那时，我们已经换了新居，第二台钢琴也搬进了家，一个琴童的艰苦旅程之上终于铺满鲜花。

一个在我们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如今已为人师，为人母。女儿南师大毕业后，考进一所中学当了音乐老师，受朋友请托业余时间辅导他们孩子学习钢琴，这些孩子，重复着女儿当年的经历，接受与女儿同样的磨练与考验，前面的道路，未知而又充满期待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实现让女儿为我弹一曲的梦想，也还没有邀请好友举行家庭音乐沙龙。但这不要紧，能亲眼看着、陪伴着女儿一步步成长，这是一种幸福，我心生欢喜，溢满自豪。

而我，也在这陪伴中成熟与深刻起来。



情牵茅草屋

□张玉兰

岁月像落叶一样飘逝，但思念这笔财富永存。一想起新中国成立前的童年生活，脑海里出现了“茅草屋”，因为它成就了我们姐妹弟四个人世之初。

听爷爷说过，在这座茅草屋里，包括我们在内，住过五代人。祖祖辈辈就是在这里繁衍生息……从这浓浓的农村生活气息和淡雅的民风民情里，仿佛看到了茅草屋的历史——贫穷、无助，墙壁斑驳，老一辈们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衣服，足板底、手掌心，磨成厚厚的老茧。仿佛一切旧梦新想就是以往的残梦回旋在我的脑海之中。

虽然这是几间不起眼的土坯草房，但它是我们老祖宗最初的“美丽”家园。大约200年前，他们在这里编织着生活、在这里开荒种地、在这里哼着自编的号子、在这里纺纱织布、在这里生育育女，以老一辈优良的传统教育方式，代代往下传……

当年我们家虽然贫穷，孩子多，但是爷爷、奶奶、父亲、母亲都很疼爱每个孩子，而且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读书。他们说：“这个年代，家里穷，读书是唯一的出路。没有文化知识，将来孩子们无路可走，那就害了他们。”所以他们拼命养猪、养羊，父亲替人家推包车，一天跑120里(每天深夜到家都得挑脚泡，第二天才能走)。家里能卖钱的都卖了，连妈妈陪嫁的铜面盆都卖了，所以我们觉得不好好学习，对不起父母。正是这样，我们四个都很吃苦，很努力。在当地中学毕业后，全国也解放了。我们四个都走出了这个穷家，出去上大学和专科学校时，特别困难的学生，能减免部分学费，而且专科学校不收学费。我们学业结束后，都分配了工作。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的政策。

从简陋茅草屋走出来的四个孩子，有主任医师、医学院兼职教授，解放军军校团职干部、高级工程师，医院检验师，作家。

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说明当年父母的思想境界不一般，他们在穷苦的情况下，让四个孩子都读书，

我与讲座

□杨 譔

“如果能在大礼堂给上百人做讲座，那该是一件多么神圣而荣耀的事啊！”很早很早的时候，我曾这么想。在谈恋爱时，有一日与女友共同憧憬未来，其中有一个，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站上高高的讲台。

我做的第一个讲座应该是在通师二附那一次，听众是小学五年级学生——我女儿的同学。事前，校领导请人带话说：“多讲自己是怎么用功读书的，不要讲自己顽皮捣蛋的事。”据说此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真实的笑话：某次考试，有一道填空题：请举出五位南通历史上的文化名人。有一学生在“张謇”之后填上了“杨譔”，老师在“杨譔”旁批道：“那个人还没死，现在不能算。”

最难忘的讲座是回到母校海门师范那次。当年的老师都不认识校友杨譔其人，等我露了面，纷纷说：“噢——原来是他，特别调皮的那个，不是叫杨徐辉吗？”也许他们在心里还说：“差生一枚呀！”那天出发前，妻子叮嘱让我换了身新衣服，还开了辆新车。

最窘迫的一次讲座是在淮安。那一年我在徐州沛县办个展，半个月后去撒展，淮安书画院的朋友知道了，嘱我回南通时在淮安停留一天，作一个草书讲座。当晚，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，我准备了讲座提纲。第二天开讲时，发现台下竟然有十多位已经成名的中青年书家朋友，他们个个书艺高过于我。我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其窘可知。

最为刺激的一次讲座是在厦门。那次是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，组委会安排我作一个讲座并签名售书。我孤身前往，当然更不可能组织亲友团什么了。讲座时间40分钟，如果自己不能一开始就吸引住川流一般的观众，极有可能出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台上自说自话的陋状。幸好那天热情观众不少，至挥毫示范环节时，场面堪称热闹；最后签名售书，又弄得超时。工作人员没法，只好上来请我们移至舞台一角，以便下一个节目登场。

最让我失望的一次讲座是在某高校。刚走进阶梯教室时，看到黑

是同村的富人家也没能做到的。

到了我的下一代，生活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老一辈的教育理念没有“失传”，每个孩子都是从学前抓紧教育，吃苦学习，所以比我们们更上了一层。

大儿子鞠明，参军转业后读医校，现是医院主治医师。女儿鞠亚玲，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，毕业后分在总参工作，转业在首都央企。小儿子鞠健夫，南师大毕业后，在扬子晚报社工作。三人都是党员。每家各有一个孩子。

大儿子的儿子鞠辰，上海交大研究生毕业，单位派驻国外做贸易工作。

女儿的女儿张露小荷，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毕业回国、清华大学研究生、书法家、中国青年设计专家、中国青年设计领袖，现任中国中铁置业集团副总。

小儿子的儿子鞠小夫，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大二在读生、钢琴家，多次荣获国内外比赛大奖，曾跟随李岚卿总理演出多场，江泽民主席接见过他。

我常对在国外的两个孙子说：“无论你们走到哪里，都不能忘了你们是中国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压在我们祖祖辈辈头上的三座大山，否则既没有我们，更没有现在的你们。所以你们学业结束，要回祖国，为祖国服务。因为你们都系着一条中国根，而这条根，系着你、系着我，归根结底，这条主根就是在中国南通农村这座小小的茅草屋里里生长的。不管穷富，祖辈们能把这条根认真培植，细心滋养，代代传承，给了我们成长的力量。所以别看这座不起眼的茅草屋，它在我们迢迢的人生旅途中，一直陪伴着我们、教育着我们，鼓励着我们几代人跟着共产党走，不断前进。也正因为这座茅草屋里的“家训”味道醇厚，所以才能永远储藏在我们的心里，希望这个优良传统，一代代传承下去，不许失传。它是构成了我们全家世世代代每个成员履历中不可缺的一页。

压压三百多名学生，不禁心潮澎湃。随着讲座的进行，发觉许多学生虽然不是低头玩手机，但明显心不在焉。讲座结束，我站在讲台上回答几个学生的提问，抬头见听讲者手持小卡片鱼贯而出，教室门口，有守候在那里的学生往那卡片上盖戳。我问：“这是干嘛？”一生答道：“盖上了章，才可以计学分。大多数人对听讲座并不感兴趣，只是为了学分。”

我还经历过一次在吵闹声中结束的讲座。那是一个系列讲座，共六讲，那天讲完专业知识后，几位听讲者希望我用笔演示。此举为何？彼此心知肚明。在连续书写了几张作品并现场送人后，我宣布不能再写了。这时，一个一直在人圈之外观望的中年男子走上前来，坚持要我为他也写一张。我说已经说好不写了，他固请。旁边有人上前问他你是哪里的？怎么从没见过你？那人就突然冲我破口大骂……

也曾做过几个似乎颇受欢迎的讲座，事后有人建议我干脆一鼓作气，整出几份讲稿，主动出击，把讲座当做产业来做。我无此“雄心”，也无此能耐，一笑而已。

做讲座，也常去听讲座，很多年前在北大和南大听过多场高水平讲座，简洁、朴素，凭学术和思想说话，真是“惟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”。近几年，各地讲座风靡，据说还与评选什么什么挂钩。有几次，组织者见听讲的人不多，还连连致歉，说是没组织好。我的想法是：做讲座不能“扰民”，还是“愿者上钩”为妥。如果静下心来回顾那些形形色色的讲座，至少一半可以办，如今货真价实，对听众确实确实有益的讲座其实并不多。

粗略地估算一下，我前前后后做过的文化讲座恐怕不下50场。如果有人问：“现在最乐意做的讲座是什么样的？”那么我会告诉他：“我最乐意做的是那些不是讲座的讲座，不拘地方，不必盛装，不要仪式和主持，听者一二人、三四人也可，我都会认真准备。事前划一个大概的范围，话风像野马一样自由，听者可以自由提问，可以反驳，可以补充……

就像木心当年在纽约给陈丹青他们讲课一样。